

【论 文】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与文献整理研究述论¹

赵梅春¹

摘要：民国时期所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遍及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台湾等地，而以西南地区为主，涉及赫哲、瑶、彝、苗、高山、黎、纳西、藏、蒙古、回、傣、羌、畲等众多少数民族，分别由政府组织的或受政府、学术机构委托、派遣的调查组和学者个人所进行。这一时期所从事的少数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主要包括对传世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辑佚、汇编、校勘、考释，对民族调查所得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对少数民族碑铭的译释和域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料和研究成果的编译。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留下了大量的具有较高可信度的资料和学术著作，培养了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人才，而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则为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关键词：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民族调查；文献整理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国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转变为将边疆民族视为抵御外侮、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民国时期在“新史学”思潮和“五族共和”观念影响下，人们认为中国历史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竞争、相互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所谓“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1] (P1)}。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2] (P6)}。“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 (P12)}故而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及当代少数民族现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促使少数民族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少数民族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和文献的整理研究、多种新型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等，标志着少数民族史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的整理、研究，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之旨趣

民国时期所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和学术著作。从当时的社会情况看，有关机构和学者从事这项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观念的变化，二是出于学术研究方面需要的考虑，三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民族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中国而外夷狄”“尊夏攘夷”等观念已被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所取代。人们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认为应该帮助、扶植他们。而要发展、扶植少数民族，则首先要了解他们。杨成志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指出：“我们既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就应该扶植他们，施以各种开化的善良办法，使他们一天一天地长进起来，将如汉族一般。这才不背着现在潮流的趋向。”^{[4] (P3)}“着手的第一步，必先明了其语言、心理、习俗和文化，然后才能渐渐做到亲善、扶植的工作。”^{[4] (P4)}这是许多从事民族调查者的初衷，他们希望自己

¹ 原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1卷第5期，2018年9月。



的调查工作能为促进边疆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王兴瑞指出：“我们民族学工作者，不仅要把我们的工作成果贡献给学术，更要贡献给我们的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在解决边疆问题上尽点贡献。”^{[5] (P105)}其所著《海南岛的苗人》最后一章《汉、黎、苗诸族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海南岛苗、黎、汉民族间所存在的问题，呼吁“要调整民族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前提，是必先彻底改变对待黎、苗的错误态度，即变蔑视为同情，变差异为一体”^{[5] (P156)}。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各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上述诸科“都可以从这块广大的学田去开掘，而做成我们研究上的新资料”^{[4] (P4)}。同时，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刺激着当时中国的学者。杨成志指出：“这种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因为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那么，我们以后还是要振刷精神，实行到民间去！在那里有许多奇葩异果，待我们去摘取的。”^{[4] (P4)}

从社会现实来看，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覬覦，使当时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了了解、研究边疆民族的重要，期待边疆民族成为抵抗外侮的力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西南地区，为了稳定局势，需要了解当地各民族的情况，因此注重对西南民族的调查。而在西北地区，日本侵略者挑拨汉回蒙藏之间的关系，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警觉，不少的学者试图通过实地调查，团结各民族，粉碎日本人的阴谋。因此，这时期的民族调查，旨在激发各民族的抗日热情、共赴国难。正如陈国钧在《贵州苗夷社会概况》中指出：“在今日敌骑踏遍半个中国……热望政府和社会人士注意苗夷族，团结苗夷族，促进苗夷族社会文化，改善苗夷族生活状况，图谋苗夷一切利益，解除苗夷种种的苦痛。”“尤望我苗夷同胞，此时应知吾全民族共同利益与共同之大敌，惟有起来抗敌御侮，才有真正自由的一天到来。”^{[6] (P13)}

2、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遍及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台湾等地，而以西南地区为主，涉及到赫哲、瑶、彝、苗、高山、纳西、藏、蒙古、回、傣、羌、畲等众多民族。从事少数民族调查者，既有政府组织的以及受政府或学术机构委托的学者，也有学者个人自发进行的。

政府机构组织的民族调查。国民政府内政部与其下属蒙藏委员会、外交部、云南省政府与民政厅，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边疆研究机构等都曾组织或委派学者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其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情况、地理、人口、民风民俗、社会生活等状况。如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现有土司调查表》《现有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发放到广西、云南、贵州、湖南、四川、西康、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责成各地民政厅详加调查。1940年国民政府下令对川、康、滇、黔四省所存土司进行调查。1934年蒙藏委员会制定《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要求西南各省凡住有苗夷民族之各县政府都要认真调查、填写，为施政之参考，调查的内容包括民族种类、户籍、人口、语言、教育情况、生活习尚等。

抗战时期为安定西南地区、了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情况，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了《西南边民调查表》，要求西南各省调查填报，调查的内容包括民族种类、居住区域、人口数目、壮丁数目、生活习惯、过去开化工作情形等。1940年因泰国诱使云南傣族外附，外交部组织对傣族进行调查，发放《云南省傣族人民调查表》，调查的内容有民族种类、人口数目、散布区域、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特殊活动情形等。20世纪30-40年代，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对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马鬃山调查报告》《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伊盟左旗三旗调查报告》《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祁连山调查报告》《昌都调查报告》等。²

¹ 作者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² 这一部分的撰写，参考了马玉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致谢！

大学与学术机构的民族调查。这类研究调查在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中占主导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大夏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都曾派出研究人员进行民族调查。其中，杨成志、江应樑、徐益棠、凌纯声、吴泽霖、陈国钧、林耀华等先生主持的调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杨成志1928年受中山大学委派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彝族（罗罗）地区，克服重重困难，行程约一千里，经过村落约二百余，获得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品，撰写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和《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等著作。1936年他率领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樑，本科生罗比宁、李秋云、刘伟民、宋兆联等组成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到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乳源三县的瑶山进行深入调查，成果发表在中山大学的《民俗》专号上。1941年杨成志又率中山大学师生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在《民俗》上发表调查报告《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并撰有论文6篇。1937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参加调查的王瑞兴撰写了调查报告《海南岛之苗人》《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1937年中山大学派研究生江应樑到云南西部考察少数民族。江应樑进入龙腾沿边的摆夷地区进行调查，并以调查所得撰写出毕业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1938年中央赈济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组织的滇西考察团中，江应樑以中山大学暨云南大学特派调查员的身份参加调查。他以这两次调查为基础，在《滇西摆夷研究》基础上完成《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一书稿。1940年中央政治学校又派遣江应樑到巴布凉山调查彝族，据此完成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书。

中央研究院也多次派遣学者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如1930年凌纯声与商承祚到松花江下游进行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凌纯声据此撰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1933年凌纯声带领芮逸夫、勇士衡到湘西进行苗族调查，将调查结果撰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凌纯声与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丽水等地调查畲族社会生活，写成了《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一书。1934年凌纯声与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等又到云南进行民族调查，调查涉及到摆夷、么些、傩傩、傩黑、傩傩、卡多、扑拉、茶山、崩龙、阿佤等众多少数民族。

抗战时期随着大批研究机构 and 高等学校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研究力量的充实使有关西南民族的调查出现高潮。如大夏大学迁往贵阳后，在吴泽霖、陈国钧的主持下，于1939年至1942年间调查研究人员深入到贵州安顺、定番、炉山、黔东八寨、都江、下江、黎平、北盘江流域各县、威宁，以及广西三江、融县、罗城等地，对苗夷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经济、宗教文化、民风民俗、语言等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贵州各县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调查报告》《贵州省东南边陲县黑苗、生苗、侗家、水家生活调查资料》等20余种调查报告，发表了《贵州苗夷社会概况》《贵州短裙黑苗概况》《贵州苗夷婚姻概述》等论文数十篇，出版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同时，还征集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珍贵文物二千余件、拍摄了照片数百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等内迁研究机构和大学也纷纷从事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成川康民族调查团，由凌纯声任团长，对四川西北和西康东北地区的羌族、彝族、藏族的社会经济生活、婚姻制度、生活习惯、宗教文化等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许多文物标本与用物。参加调查的马长寿因此撰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此外，任职于西南联大的陶云逵、云南大学的田汝康、李有义、费孝通、金陵大学的柯象峰、燕京大学的林耀华等也组织人员进行民族调查，撰写了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如林耀华先后率考察队到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康北部、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对分布在这里的彝族、康北藏族、嘉戎藏族进行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凉山彝家》《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云南大学的田汝康撰有《芒市边民的摆》，李有义通过对路南撒尼族地区的民族调查，撰写了《汉夷杂区经济》一书。

学者个人的民族调查。民国时期还有不少的学者独自从事民族调查。1911年至1914年间，丁

文江在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同时,对云南、贵州和四川凉山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发表了《贵州的土著民族》《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9年、1935年林惠祥曾两次到台湾调查,撰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1935年费孝通夫妇在金秀瑶山进行50余日的民族调查,完成了《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一书。1938年李安宅、于式玉夫妇到甘肃拉卜楞寺调查藏区,直到1941年才离开。李安宅据此次调查撰有《拉卜楞寺的僧官暨各级职员类别》《黄河南亲王与拉卜楞(附表)》《拉卜楞寺保护神——佛教象征主义举例》《萨迦派喇嘛教》《拉卜楞寺概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西藏系佛教僧教育制度》和《喇嘛教育制度》等多种论著,对藏传佛教重要寺庙拉卜楞寺的僧官制度、名称、等级及其职能、一年之中各种宗教礼仪与活动所举办的僧众大会进行剖析,分析了佛教僧侣教育的结构系统、学位等级和运行机制。俞湘文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拉卜楞巡回施教工作时,深入到甘南藏区藏族家庭进行调查,结合文献资料撰写了《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一书,对游牧藏族聚居区的历史沿革、地理概况、政治、家庭组织、人口、经济、教育、卫生、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等进行了全面的叙述分析。

二、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初步研究

民国时期学者有关少数民族文献的搜集与初步整理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关传世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辑佚、汇编、校勘、考释,二是对调查所得的少数民族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三是对有关少数民族碑铭的译释,四是对域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料进行编译。

1、有关传世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

民国时期,王国维、金毓黻、冯家昇、傅乐焕、王仁俊、黄任恒、罗福颐、张元济、陈汉章、吴丰培、金梁等诸位都对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传世文献进行过整理研究。关于蒙古文献的整理,王国维著有《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是整理研究蒙古史料的代表性作品。他不仅对这四种书籍进行文字校勘,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纠正了前人认识上的错误。如关于《蒙鞑备录》的作者,他通过考证认为是赵珙而非原题的孟珙。学者们普遍认为《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蒙古史研究的力作。此外,沈曾植、张尔田注释整理了文津阁汉译本《蒙古源流》,后以《蒙古源流笺证》之名刊行。

在辽金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金毓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于20世纪30年代主编的《辽海丛书》,分专著、杂志、文征三类汇集东北先贤著作、地方志、历代记述东北史地的文献,以及当代学者研究东北史地的著作,共出版10集83种,内容洋洋大观。其中有不少关于东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如《辽小史》《金小史》《渤海国记》《松漠纪闻》等,保存了东北地区珍贵的民族文献。他还撰有《辽东文献征略》。冯家昇、傅乐焕、王仁俊、黄任恒、罗福颐等主要对《辽史》进行校勘、补遗、研究,并对辽代文献进行搜集。冯家昇撰有《辽史初校》《〈辽史〉〈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罗继祖撰有《辽史校勘记》,张元济撰有《辽史校勘记》(稿本),傅乐焕撰有《辽史复文举例》《宋辽聘使表稿》,王仁俊撰有《辽史艺文志补证》,陈汉章编有《辽史索引》,罗福颐撰有《辽文续拾》《辽文续拾补遗》《满洲金石志》,黄任恒著有《辽痕五种》,包括《辽代纪年表》《辽代文学考》《辽文补录》《辽代金石录》《补辽史艺文志》。

在西夏文献的整理方面,目前所见有罗福成撰《西夏国书类编》(北平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罗福袭撰《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袭、罗福颐撰《宋史夏国传集注》,罗振玉刊印《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等著作。

关于满族文献,20世纪初期金梁曾组织人员翻译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的《满文老档》,后以《满洲老档秘录》为题刊出部分译稿,后改称《满洲秘录》。继金梁之后,鲍奉宽、齐增桂、张

玉全和李德启等对康熙至宣统年间的《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以及军机处档簿、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发现的《满文老档》及《满文木牌》等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李德启编辑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

关于藏族文献的整理，吴丰培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西藏图笈录》，先后出版了《清代西藏史料》第一辑、《清季筹藏奏牍》等。

2、有关调查所得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

民国时期的学者除对传世少数民族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外，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同时，也注意整理调查所得的少数民族文献。在彝族文献的整理方面，丁文江在彝族经师罗文笔的帮助下翻译、整理出《爨文丛刊》，汇集了《千岁衙碑纪》《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十一种彝文经典，约十余万字，包含了川黔滇彝族的重要文献。20世纪80年代，岭光电、张兴、唐承宗等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协作，对这套丛书进行了增订工作，出版了《增订爨文丛刊》^[7]。

杨仲鸿、方国瑜、李霖灿对调查所得纳西族东巴经进行了整理。杨仲鸿在东巴族经师和华亭的帮助下撰写了《么些文多巴字及哥巴汉字译字典》（稿本）。方国瑜在东巴经师帮助下编成《么些文字汇》，用国际音标为东巴文标音，以汉文解释东巴文的文义，并分析其结构。他还对东巴经进行分类编目，对纳西族的摩崖、喇嘛文墓碑、滇西北第一大碑“石鼓碣”进行考证研究，写有“奇文摩崖”“石鼓碑记”等杂记。李霖灿从1939年在丽江从事四年的民族调查，学习东巴文、东巴经，搜集、翻译整理东巴经典，1944年编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6年完成了《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他还收集了纳西象形文字经典一千二百三十余册，标音文字经典三册，译注了二十余部纳西象形文字及标音文字经典。后将译注的部分东巴经辑为《么些经典译注六种》（1957年出版）、《么些经典译注九种》（1978年出版）。这些调查和整理研究对保存、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突出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学者还搜集整理了一批土司的家族谱，如方壮猷著有《雷波屏山沐川等县土司家谱》《蛮夷司文等九土司家谱》，无畏撰有《德格土司世传译记》、陈秉渊著有《青海土司世系考》等。

3、有关少数民族碑刻资料的整理研究

有关少数民族石刻碑铭的考证、释读主要集中在古代突厥文碑铭与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碑铭等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陆续发现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塔拉斯碑》《噉欲谷碑》《阙利啜碑》《磨庭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等突厥汗国与漠北回纥汗国时期的突厥碑铭。其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一面为突厥文、一面为汉文，但两种文字的内容无关，《九姓回鹘可汗碑》用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写成。清末，中国学者沈曾植、李文田、三多、盛伯熙等，或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的汉文部分作跋，或进行著录和解读。民国时期，有学者开始对突厥碑铭突厥文部分进行整理研究。1935年韩儒林将德国人施德尔、英国人罗斯所译突厥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噉欲谷碑》转译成汉文，这三通碑铭的突厥文内容始为国人所知。他所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包括三部分：阙特勤碑之发现及其研究之经过、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文、突厥文阙特勤碑注释。其注释部分广泛地征引史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译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职官、史实进行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突厥碑铭和突厥历史。他还撰有《读阙特勤碑札记》一文，并翻译了汤木森著《蒙古之突厥碑文导言》，为学者们进一步了解突厥碑铭提供了便利。岑仲勉在韩儒林的基础上对突厥文碑铭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研究，1937年发表的《跋突厥文阙特勤碑》旨在补韩儒林译注之不足。他对韩儒林译注中未确定的有关人名、官名、地名、部族名进行考释，并对有关词汇的释读提出新的认识。1938年王静如据兰斯德《两个回纥如尼文碑文》将《毗伽可汗碑》译成汉

文，并加以考证，名为《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对铭文中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如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的事迹、唐宁国公主之下嫁回纥，以及助唐安禄山之乱事迹，以碑铭与两唐书《回纥传》相对照进行阐述；对碑铭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职、纪年方法等也进行了考释与研究。此外，朱延丰对《噉欲谷碑》进行系统的研究，撰有《突厥噉欲谷碑铭译文笺证》一文，介绍了碑铭的发现经过和国外学者对其研究情况，且以铭文方位为序予以翻译，并结合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对铭文中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黄仲琴著有《阙特勤碑》《再谈阙特勤碑》。

同时，罗福成、王静如等则对女真文碑铭进行了整理研究。罗福成撰有《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二文；王静如撰写的《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一文，对罗福成文《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所释文字有所增益。《宴台金源国书碑考》考证出碑铭为女真进士题名碑，立于金哀宗正大元年六月，其文字为女真小字。《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首先是对碑文女真字的汉字注音，次为碑铭原文，再是汉语意译。《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分三部分：引言、碑文译释及女真语之重造、结语，并附有英文摘要。其中，碑文译释及女真语之重造部分，则是对碑文进行的音译、意译，并根据《金史》对其意译内容进行详细的考证解释，所谓女真语之重造是指用满语重写碑文。

罗福成、王静如对辽代陵墓出土的哀册也进行了考释。罗福成所撰《道宗宣懿皇后哀册文释文》《道宗皇帝哀册文释文》《道宗皇帝及宣懿皇后哀册篆盖释文》《兴宗皇帝哀册文释文》《兴宗仁懿皇后哀册文释文》等文，根据拓本或抄本照片将对用契丹小字撰写的皇帝、皇后哀册进行摹写，并对其中少量的契丹小字进行考释。王静如则撰有《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试》等。金毓黻编著有《辽陵石刻集录》。

罗福成还对西夏文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他所著《居庸关石刻》抄录了居庸关石刻上的西夏文、汉文部分，并对西夏文做了注释，所著《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将北平图书馆藏西夏文经典书名译为汉文。有关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白寿彝对回族史料的整理研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1945年出版的《咸同滇变见闻录》，汇集了杜文秀的起义资料，包括檄文、誓师文、布告、管理军政条例、书信、对联、匾额、楹联、批示、委牌、职官题名录、亲历或亲见事变者的记述、传闻者的记述等，这些大多是民间传抄之本和未经刊布之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域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记载和论述也颇为关注，如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沙畹著《西突厥史料》《马可波罗行纪》等。张星烺所编辑的《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也收录了域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记载的文字资料。

三、少数民族调查与文献整理研究的意义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调查和文献整理研究，在20世纪民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言，第一，积累了丰富的可信资料。调查者多数有留学西方的学术背景，普遍接受过人类学（民族学）的系统训练，他们的调查都是按照现代民族学的调查规范进行的，撰写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都详细地记述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婚姻习俗、生育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教育制度、居住条件、公共活动与娱乐、丧葬仪式等，还大量搜集当地少数民族文物。所得资料多为自己亲历亲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时期社会历史调查所积累的资料尤显珍贵。

第二，培养了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人才。参加民族调查的学者除了著名的民族学家外，还有青年学者和学生，他们通过调查实践迅速成长起来，成为20世纪后期民族史学研究的主力。他们追溯自己的学术发展道路时，都会提到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民族调查。如著名民族学家谷苞曾说，在云南大学跟随费孝通从事社会调查奠定了其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8]。

第三,为20世纪后期民族史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马长寿、方国瑜、林耀华、费孝通、李有义、黄现璠、江应樑、谷苞等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推动了民族史学的繁荣。他们在民国时期所从事的民族调查为其新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础。如费孝通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时,指出:“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在接触实际中酝酿和形成的,理论离不开实践。我这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9] (P163-164)}说明这一创造性理论的基础植根于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新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中,民国时期的调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费孝通、黄现璠为1951年6月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正、副团长,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6年8月,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并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1956年至1961年李有义深入到西藏和四川藏区进行民族调查。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尽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20世纪后期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20世纪后期有关古代突厥碑铭的整理研究早已超越了韩儒林等人,但他们却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世学者对此有充分的共识。耿世民论及突厥碑铭的研究历程时指出:“我国学者韩儒林、岑仲勉等人也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做出了贡献。”^{[10] (P12)}刘凤翥、于宝林论及契丹文字研究概况时,认为王静如、罗福成等是契丹文字研究的开拓者,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还认为金毓黻的《辽陵石刻集录》成为中外契丹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11]。

又如白寿彝20世纪50年代编辑出版的四册《回民起义》资料,为研究回民的反清起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书是以《咸同滇变见闻录》为基础扩充而成的。这表明,20世纪有关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学者做出了杰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 [2]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9。
- [3] 梁启超:新史学[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A],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5] 王兴瑞:海南岛之苗人[A],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6] 陈国钧:贵州苗夷概况[A],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7] 马学良:《增订彝文丛刊》序言[J],民族语文,1983(2)。
- [8] 谷苞: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J],西北民族研究,2006(1)。
- [9]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A],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10]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纪念汤木森解读突厥文一百一十年[J],西北民族研究,2004(3)。
- [11] 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字研究概况[A],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